

---

# 来沪支援子女型移居老年人社会适应状况调查<sup>\*1</sup>

张苹

(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0040)

**【摘要】**:目前上海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在就业及其子女教育等方面有倾斜性的政策,但对支援子女型移居老人仍需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实现异地报销、增大报销额度、简化报销手续,降低出行费用,都是移居老人们所希望的。相关部门可针对这些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让长期居住在上海的移居老人能够享受到与上海老人同等或类似的福利待遇,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上海的生活。

**【关键词】**:支援子女型;移居老人;社会适应

**【中图分类号】**:D669. 6. 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7)09—0102—007

移居是指更换居住地后的长期居住行为。移居老人是指在年老或退休后,迁离其工作生活过的原居地,搬迁到其他城市或地区居住的老年人。随着我国城市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老年人口的移居已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支援子女型移居老人群体的出现,是劳动力转移的伴生现象,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的组成部分。在人口红利不再、“用工荒”已经显现的情况下,加强对支援子女型移居老人的关爱,提高移居老人的幸福指数,让他们融入新的城市快乐地安度晚年,不仅考验着城市的智慧和包容性,更是考验能否留得住人才,给城市的长期发展提供稳定而持续的人力支撑。

## 一、相关理论及研究对象界定

### (一)相关理论与研究

现有的研究表明,美国在1995—2000年老年人的移居达到22.8%,日本2000—2005年为11.7%,英国1981—1991年老年人的移居率为35.4%。国外学术界对于老年人移居一般归纳为3个阶段:一是退休以后追求自然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发生的主动型移居;二是当配偶死亡后为了接受子女的照顾而产生的移居;三是当老年人需要日常的护理时,居住到养老设施的移居。

相对于国外学术界开展的大量移居老人研究,我国针对移居老年人群体社会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移居老人作为流动的老年人口在中国的流动人口大军中所占比例较低,因此常常成为被忽略的对象。孟向京认为,这是由于流动老年人口在总的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低,而且已经完成生命过程中的教育、就业等重要阶段,相对于流动儿童而言,他们往往被视为没有特殊问题的一类人,因而往往容易被忽视。<sup>[1]</sup>在移居老人的相关研究中,涉及在流入地的适应状况、生活状况、遇到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等方面,但是相对于大量农民工等青年劳动力流动人口的研究,这类文献的数量并不多。移居老人在流入地遇到的困难是学者们较为关心的问题,包括生活适应困难、社会交往缺失、社会保障的流失(李珊,2010;<sup>[2]</sup>王婷婷,2011;<sup>[3]</sup>孟向京,2004)等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析影响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要素,包括老年人自身层面、家庭关系层面、社会网络层面、客观环境方面、制度层面(牛菲,2011;<sup>[4]</sup>李珊,2011)。

---

<sup>1</sup>基金项目: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专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201531500181—10002)。

作者简介:张苹,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二) 研究对象界定

国内学者根据老年人口移居的缘由将移居老人分为4类,包括投靠子女型、支援子女型、追求生活品质型和落叶归根型(李珊,2010)。<sup>[5]</sup>本研究所指的移居老人特指支援子女型的移居老人(下文简称移居老人),具体指那些不以从事经济活动为目的、为帮助子女照顾孙辈而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老年人。具体为:非上海户籍;来沪居住时间半年及以上;年龄设定为男60岁及以上、女50岁及以上。此外,并不限定研究对象的城乡户籍、性别、职业等因素。

同时,对移居老人子女也明确要求为上海“青年新移民”。所谓“青年新移民”,需要满足“安家”或“落户”的条件之一。“安家”是指已婚且购买产权房;“落户”是指已婚且户籍地由外省市迁入上海。夫妻双方有一方符合上述条件的,即可视作为“青年新移民”。之所以设定这样的条件,是因为满足安家或落户条件的,子女最有可能在上海永久居住,父母移居上海的时间会较长,甚至永久定居上海,更需要关注。

## (三) 研究方法

2015年5—7月实施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两种方法收集资料。其中,问卷调查考虑到调查对象选取的可操作性,通过非概率抽样中的“滚雪球”抽样,以移居老人的“青年新移民”子女作为调查对象,间接了解移居老人的现状及其在沪家庭生活状况;个案访谈以移居老人本人作为访谈对象。

问卷调查共采集517名青年新移民样本信息,其中男性229名(44.1%),女性290名(55.9%);平均年龄32.94岁,年龄标准差3.85岁。其中,近半年家中有移居老人的有310名(60.0%)。从这部分移居老人中随机选择15名进行个案访谈,其中女性10名,男性5名。女性年龄在50~66岁之间,男性年龄在54~64岁之间。有1名丧偶,7名与老伴分居,独自来沪;6名与老伴共同来沪。6名来自城镇,9名来自农村。10名与儿子儿媳共同居住,4名与女儿女婿共同居住,1名由于子女同在上海,在儿子和女儿家都住过。6名的子女为独生子女,8名有2个子女,1名有3个子女。为遵守保密原则,文中将15名访谈对象以A1—A15代称。

# 二、移居老人的社会适应状况

将移居老人的社会适应分为4个维度:心理适应、关系适应、生活方式适应、社会环境适应。这4个维度并不呈现线性发展,而是盘根错节,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同时,这4个维度并不是唯一的、固定的,会根据研究对象的回答进行完善与调整。

## (一) 移居老人心理适应状况

心理适应包括移居老人在情绪方面的心理感受及角色变化。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提到,不得不搬到新城市照顾孙辈的移居老人,已日渐成为精神卫生门诊的常客,社会应高度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1. 心理感受:想家、孤独。初到上海,老人们面对生活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变化,在心理上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家。一是想念家乡熟悉的事物、人际关系以及风土人情。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思乡的程度更深。二是挂念家中独居的老伴。调查显示,只有不到半数的移居老人是双方同时在子女家(47.5%),其他父母都处于老夫妻两地分居的状态。三是担心家中年迈的父母。支援子女型的移居老人大多属于相对年轻的低龄老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家中还有年老多病的父母或公婆。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并非单纯的想家,更多的是对家里人的担心与挂念。四是由于与子女和周围的人缺乏沟通导致的强烈的孤独感。

2. 内心纠结:想撂挑子,却又不忍。学界常用推拉理论来解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原因及原理,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虽然移居老人和劳动力迁移有所不

---

同，但同样可以用推拉理论的原理分析其来上海的原因。移居老人作为退休老人，可为子女做较多的事情，这种推力促使老人来到上海。同时，上海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作为流入地的拉力牵引着老人。当然，流出地也会有一部分拉力，那就是老人的老伴、亲友，熟悉的环境与风土人情。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不难理解移居老人内心纠结的矛盾心理。

3. 家庭中自我角色转变:由权威的父母到照顾人的“保姆”。来到子女家中，移居老人的角色由曾经权威的父母变为照顾人的“保姆”。调查发现，多数家庭(60.0%)的事情由“小夫妻决定”，少数家庭(39.0%)由“夫妻双方与父母商量决定”，而由“父母决定”的仅占1.0%。访谈中，当被问到来到上海之后，在家庭中的定位与角色时，访谈对象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支援子女型的移居老人都认为自己来上海的任务就是做好子女的后勤保障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孙辈人，甚至有的访谈对象调侃地将自己比作是“不花钱的保姆”。他们面对自己权威的失落和角色的转变，都会表现出一定的消极情绪。

## (二)移居老人关系适应状况

关系适应包括家庭内部关系、社会交往以及社区参与等。随着移居老人逐渐退出社会及其生活范围的缩小，家庭作为其活动的核心区域对他们来说越来越重要。除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移居老人的上海生活。

1. 亲子关系。由于家庭生活占据了移居老人生活的绝大部分，所以对家庭关系的适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移居老人来到子女家中，家庭关系的主轴由“亲子”转为“夫妻”(小夫妻)，移居老人与子女间的关系与过去相比疏远很多。大部分老人表示，子女与自己的沟通交流逐渐减少。调查发现，大部分子女(51.8%)只是“有时”跟移居老人父母聊聊天，18.3%“很少”跟父母聊天，“经常”或“总是”跟父母聊天的分别占16.7%和13.2%。访谈中的总体感受是，那些作为爷爷奶奶身份的移居老人，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相较于外公外婆身份的移居老人来说，似乎与孩子的关系更为疏远，也更难适应家庭关系的转变。

2. 夫妻关系。面对已经成家的子女，老伴是移居老人最大的精神支柱。无论是双方一起在上海，还是独自来沪承受两地分居的移居老人，他们的夫妻关系相较来沪以前更加和睦、对对方更加依赖。同老伴一起来沪的老人，可以共同面对环境的变化与最初的不适，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会升温;独自来沪的老人由于两地分居，反而增加了对对方的关心与挂念。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夫妻关系的和睦可以帮助老人缓解在上海生活的不适状态。

3. 人际关系。移居老人的人际关系经历了从不愿意走出家门，到逐渐尝试寻找新朋友的过程。最初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对于移居老人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并非易事，很多移居老人并不愿意走出家庭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这主要是由于语言不通，导致移居老人不愿意与他人多接触。人是社会的人，是需要沟通交流的，因此语言不通给他们造成的不适应，似乎是所有不适应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因素，也是影响他们人际关系的关键障碍。而那些来自同一个省“老乡”，成为他们人际关系中发展最快、最重要的关系。另外，由于看孩子是支援子女型移居老人的主要生活内容，因此带孩子出来玩的时候，也容易较为自然和顺畅地接触到其他的老人，从而寻找新的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关系较为表面化，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时，人际关系的匮乏暴露了移居老人知心朋友和社会资本的缺失。

## (三)移居老人生活适应状况

移居老人从老家来到上海，他们要告别的不仅仅是熟悉的家乡，更是告别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变化了的生活方式，会导致移居老人产生各种不适用。

1. 子女带养。移居老人与子女发生代际矛盾最主要的原因是“子女带养”，占58.2%，这与支援子女型移居老人来上海主要是帮忙照顾第三代有关。访谈对象A9提到，以前在喂孩子吃饭喝奶的时候争执过一次，挺不开心的。他们嫌我用自己的筷子、汤勺给孩子吃不卫生，还有奶瓶没洗干净什么的!结果我妥协了，还是听他们的吧，我们老观念现在也不能用了，年轻人总

是对的。

2. 生活习惯。与子女生活习惯的差异是每个移居老人都面临的问题，两代人常常由于“生活习惯和生活琐事”发生矛盾(55.9%)。移居老人作为老年人，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必然与其子女有所不同，大部分移居老人提到，他们与子女的生活习惯差异主要是饮食与作息习惯。面对这个问题，最初的阶段，他们可能会不认同子女，向子女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并不奏效。经过一段时间，很多老人都会选择顺从子女。

3. 消费观念。两代人消费观念的不同，也是产生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占24.9%。移居老人基本都经历过艰苦的岁月，一般生活都比较节俭。对于子女的消费习惯，大部分移居老人表示并不十分认同。在他们看来，子女铺张浪费，很多钱花在不该花的方面。有的老人表示，孩子爱去饭店吃饭，在外面吃一顿好几百块钱，可以在家里吃好多天了。

#### (四) 移居老人社会环境适应状况

社会环境适应包括对该城市的居住环境、社会风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适应。大部分移居老人通常认为上海的居住环境相对于老家来说较为“狭小”，对于来自农村习惯于住平房的老人，这种感受更为明显，他们更加怀念曾经宽敞的、相对开放的居住环境。有些老人对于上海的气候、交通以及城市环境也会感到不适，甚至会引发一些身体方面的疾病。

对于社区居住环境，移居老人几乎无一例外持肯定态度。通常情况下，居住环境给移居老人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而且都表示上海房价贵，可以理解。因此，在移居老人看来，尽管会遇到上述这些情况，但是这些作为客观的因素似乎都可以忍受。

社会福利作为社会支持环境的一种正式制度性支持，是一种环境中介因素，具有缓冲应激压力、维持良好情绪体验、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作用。这主要包括国家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区组织的帮助。目前，上海尚未出台针对移居老人的相关福利政策，很多上海本地老人能够享受的政策对于移居老人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移居老人虽然人在上海，但由于受到户籍与社会政策的限制，既流失了原居住地的一些福利，又无法享受与上海老人同等的福利。这种社会支持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移居老人的社会适应与归属感。比如，(1)大部分移居老人都提出了医保问题，人在上海发生疾病返回原居住地治疗非常不便，而在上海看病回到户口所在地报销的手续又非常繁琐。(2)体检问题是许多来自城市的移居老人所关注的。在原籍，他们可以享受到一年一次的体检，但到上海后此待遇也就自然失去了。许多人希望居住社区能够组织类似的体检。(3)在上海，户籍老人看病、公园门票、看电影等都有一定的优惠政策，而移居老人却无法享受这些优惠。以上种种，都会让移居老人有一定的客居感，影响老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 三、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在调查问卷结果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访谈对象直观的、面对面访谈中的观察和体会，提炼、总结移居老人在沪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

#### (一) 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个体层面上来看，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等都会对移居老人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

1. 个人健康状况对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影响分析。个人健康状况对于移居老人的社会适应性的影响程度不仅直接，程度也较深。虽然大部分移居老人都是比较年轻的老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身体机能已经在下降，通常会出现各类慢性疾病。访谈发现，个人健康状况较好的移居老人，能够更好地承担家中事务，开展较多的休闲娱乐活动，在社会适应性程度和对生活的

---

满意程度两方面都表现出了良好的趋势。但是对于身体状况较差、承受着慢性疾病折磨的老人来说，在身体上受的折磨严重损害了老人的心理状况，并且随着患病之后自己给家庭造成的困难和负担，使得这部分老人不仅仅要承担来沪后的心理不适，还要承担在精神上的内疚感和无助感。

2. 心理因素对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影响分析。老年人自身的心理因素，包括其性格特点与心态也影响着其适应状况。心态好的老人通常对生活拥有积极乐观的看法，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突如其来的变化而适应生活。心态不好的老人则较为悲观，经常用曾经的快乐和现在的劳累相比，在一定程度上会把当前的困难扩大化。访谈对象 A7 来自江苏淮安，曾经是一名后勤部主任，她独自来沪后最初面临产后抑郁的儿媳很手足无措，但是她能够非常乐观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并且坚强的克服家庭困难，最终家庭关系较刚开始好了许多。

3. 社会经济地位对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影响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年人的生存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地增加，但是随着来沪后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经济收入的减少，使得经济需求对于移居老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上的全依赖性降低了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程度。访谈发现，部分来自农村、没有经济来源的移居老人，在经济上对子女的全依赖性，使得移居老人的生活支出、医疗支出等完全由子女承担，这无疑增加了移居老人的心理负担，降低了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程度。经济上的半独立性有利于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顺利实现。移居老人在经济上的半独立性主要是指通过退休工资和原有存款等，在经济来源上并不完全依赖于子女。经济上的半独立性，使得老人不必在生活成本上向子女“伸手要钱”，可以继续保持在家庭中原有的自尊和家长的地位以及精神上的独立性，这都使得移居老人在家庭生活中依然保有话语权，依然享有家庭成员的尊重。这样的状况有助于避免移居老人出现自卑消极的情绪问题，同时在物质供养方面也更加具有稳定性。通过访谈，我们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经济上不完全依靠子女的移居老人在来沪后生活中的适应性都是基本良好的，在家庭中和子女的关系比较和谐融洽，自己对于来沪后的生活也基本满意。

## (二) 家庭关系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家庭是人们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在人们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过程中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尤其对于移居老人而言，由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另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并且需要慢慢地融入这个新的环境中去，在这一过渡的过程中，家庭显然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1. 亲子关系。谈到亲子关系不得不提的就是代沟，代沟是指社会的不同世代之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方面出现的差异、隔阂，甚至冲突。任何一对亲子关系之间都存在代沟，移居老人与子女的代沟更深。究其原因，移居老人从家乡来到上海，仍然会保留家乡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而他们的子女作为来到上海打拼，立志扎根于上海的第一代移民，已经习惯上海的生活与节奏。面对代沟产生的种种差异，双方之间的分歧必然会增多。代沟通常与社会适应成正相关的状态，这种差异越大，老人的社会适应难度就越大。

2. 婆媳关系。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内部关系的一个传统难题，是最微妙、最难相处的一种关系，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在 15 名移居老人访谈对象中，大部分移居老人都是在儿子家住，也有少数老人在女儿家住过一段时间。访谈发现，大部分同儿子儿媳共同生活的女性移居老人表示都会或多或少出现婆媳问题。其中一位奶奶身份的移居老人较为典型，谈到了自己与媳妇的几次冲突，她不禁落泪，表示一旦与儿媳出现争吵，就特别想回老家。

3. 夫妻关系。面对已经成家的子女，老伴是移居老人最大的精神支柱。“少年夫妻老来伴”这句俗语，在移居老人夫妻面前体现得更加透彻。因此，夫妻双方同时在沪的移居老人，他们的社会适应状况相比一方在沪的移居老人要更好一些。这是因为双方同时在沪的移居老人在共同面对环境的变化与最初的不适时，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会升温，这种和睦的夫妻关系反过来可以帮助老人缓解在上海生活的不适状态。

---

总之，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仅可以帮助移居老人更好地融入子女家庭，同时也有助于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新的环境。反之，不良的家庭关系，会使得移居老人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出现适应障碍，从而影响其融入社会的心理状态。同时还可能会造成移居老人不良的人际互动，影响他们适应新环境的信心，增加社会适应的难度。

### (三) 社会资本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如果说个人与代际关系分别属于微观与中观层面的影响因素，那么社会资本可以看作影响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宏观因素。桑德斯(Sanders)等研究者发现社会资本在移民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发现移民在迁入地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对于他们是迁入目的地后新生活的适应和经济地位获得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移居老人与该研究中的移民不能完全等同，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也不能等同，但同样都可以反映社会资本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指人所拥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可以称之为关系型社会资本。来沪后移居老人的关系型社会资本不断减弱，尤其是以前因地理生活范围、从事职业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网都会因地域的变化而呈现中断或半中断的状态，再加上新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无法短期内建立，社会资本的阶段性缺失给移居老人的社会适应带来不良的影响。

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既定的社会制度，即制度型的社会资本。制度型社会资本主要指一定的组织、制度和规范。制度型社会资本也会给移居老人的社会适应带来影响。目前移居老人们通常无法享受到上海的一些福利支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客居感，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在前文的文献综述中，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养老保险政策的不完善也影响着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

## 四、促进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对策建议

由于社会政策的缺位，移居老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之中，但他们游离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外，这使得他们难以在城市社会“扎根”。在城市生活的“孤岛化”使他们并没有在社会、心理层面被完全“嵌入”，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文化系统中，在心理上自然会产生一种疏远甚至不被认同的感受。社会政策作为正式的制度性支持可以为移居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政策保障。目前上海市还没有专门针对移居老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与上海本地老人的福利落差会导致移居老人的客居感。尽管有些移居老人希望自己能够回家养老，在上海也仅是几年时间，但制度与政策的缺位仍然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目前上海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在就业及其子女教育等方面有倾向性的政策，但是对于被学界和社会忽视的移居老人，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实现异地报销、增大报销额度、简化报销手续，降低出行费用，都是移居老人们所希望的。相关部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让长期居住在上海的移居老人能够享受到与上海老人同等或类似的福利待遇，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上海的生活。

社区是移居老人最主要的生活区域，他们的生活基本局限于社区之中，社区对于移居老人社会适应的影响巨大。为了移居老人更快更好地融入新地区的社会生活，解决情绪困扰及排解孤单等问题，应当在社区层面，促进移居老人社会组织建设。由负责老龄问题的社区专干牵头，社区提供便利的条件，由移居老人自发组成各类休闲娱乐信息交流的社会团体。同时，在社区层面建构移居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发扬邻里间互帮互助的精神，创建社区邻里文化，保障移居老人尽快适应社会。

在空巢化越来越严重，养老形式也日趋严峻的环境下，支援子女型移居老人解决了工作与养老两难的难题，让亲人分离变成了亲人相聚，让晚景孤独的凄凉不再，让子女休假长途奔波为看一眼父母的烦恼不再。让老年人有了儿孙绕膝之欢，儿孙尽孝也能“做在当前”，可以说这是一种双赢，也是未来上海引进人才解决父母空巢的一种出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的优良传统。移居老人是一个等待关爱的群体，加强对移居老人的精神关爱，提高移居老人的幸福指数，让他们快乐地安度晚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

**参考文献:**

- [1] 孟向京等. 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 [J]. 人口研究, 2004(6).
- [2] 李珊. 城市化进程中移居老年人的问题研究 [J]. 济南大学学报, 2010(6).
- [3] 王婷婷. 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透视“老漂族”的社会状况 [A]. 贵州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 [C], 2011.
- [4] 牛菲. 进城老年人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以保定市为例. 河北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
- [5] 李珊. 城市化进程中移居老年人的问题研究 [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20 卷第 6 期。